

论习近平文化思想对西方文明观的批判与超越^[*]

于安龙

(天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天津 300350)

[摘要]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习近平文化思想不仅反映和遵循了人类文明发展规律,总结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经验,而且在诸多方面实现了对西方文明观的批判和超越,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它批判历史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主张正确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批判文化霸权主义、文化殖民主义,主张捍卫文化主权、维护文化安全;批判“普世价值论”“普世文明论”,倡导全人类共同价值、各国独特文明;批判文明等级论、文明优越论,倡导文明平等、文明共存;批判文明隔阂论、文明冲突论,倡导文明互鉴、文明交流。

[关键词]习近平文化思想;西方文明观;文明发展;批判;超越

DOI:10.3969/j.issn.1002-1698.2024.03.002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1]当前,面对“两个大局”的相互交织、相互激荡,以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任务、新挑战,迫切需要发挥文化的雄厚力量、激发文化的内在活力。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供了重要遵循和实践指南,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科学指导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不仅反映和遵循了人类文明发展规律,总结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经验,而且与西方文明观有着根本区别,并在诸多方面实现了对西方文明观的批判和超越,为人类文明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一、批判历史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主张正确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作为一种社会思想观念,历史虚无主义产生于西方社会。其形成后,在西方社会、思想、艺术、文化等方面产生了广泛影响,并逐步蔓延至其他国家和地区,成为一种具有较大影响的社会思潮。就其本质而言,历史虚无主义是对传统理性主义和客观主义支配下的历史认识的一种反叛,是建立在怀疑

作者简介:于安龙,法学博士,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中国共产党开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程和经验研究”(22BDJ010)的阶段性成果。

论基础上的历史观、认识观。历史虚无主义在不同历史时期、历史阶段,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和外化样态,甚至在其基础上衍生出了民族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等各种形式的虚无主义。而无论是历史虚无主义,还是民族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等,在基本倾向方面都具有相似性、共同性,即都秉持怀疑一切、否定一切的态度和思想观念。具体而言,它们都盲目地全盘否定人类历史文化、民族历史文化,不加分析地否认历史规律的客观性,以偏概全地透过个别现象否认本质,一叶蔽目式地以支流否定和替代主流,片面注重细枝末节而忽视了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机械地、孤立地以历史中的局部错误、阶段错误否定整体历史过程,其实质是历史唯心主义。

历史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是一种盲目否定历史及其文化的错误思潮,在现实中极具危害性。这种“一切皆为虚无”的虚无主义态度,容易导致人们对历史、对文化、对现实等产生质疑、悲观心理,助长颓废主义人生观、价值观的滋生。历史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在中国并不是孤立存在和传播的,而是往往与“全盘西化”纠缠、叠加在一起的,其惯用手段和伎俩就是重此轻彼、“以西非中”。历史虚无主义者、文化虚无主义者对历史采取淡忘主流、选择性失明的方式,别有用心地放大支流、夸大不足,碎片化、庸俗化地解读历史。通过本末倒置、黑白颠倒的方式,抹黑领袖人物、英雄模范人物,否定和歪曲民族发展史、文化发展史、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以达到肢解历史、颠覆经典、解构英雄的目的。在对民族历史和优秀传统文化采取蔑视、虚化和否定态度的同时,历史虚无主义者、文化虚无主义者又大肆宣扬西方资产阶级人性论,极力鼓吹西方文化、西方文明,继而主张“全盘西化”。他们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是根本对立的,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就必须彻底抛弃中国的传统文化,全面地接受西方的价值观、人生观和整个文化模式。这些虚无主义论调对民族历史、民族文化采取视而不见、故意贬损的态度,严重偏离了历史反思、文化反省的轨道,其本质是要通过去历史化、去民族化,达到使中华民族丧失民族独立性、文化独立性的目的。虚无主义者不仅否定了本民族文化的存在意义和价值,而且还否定了其向现代转化的可能性、可行性,这就割断了文化精神命脉,摧毁了民族精神家园。所以说,历史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的观点既是形而上学的,又是违背客观事实的,极易造成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混乱,继而导致以假乱真、混淆视听、以讹传讹、数典忘祖等情况,可以说是贻害无穷。

对民族历史、民族文化全盘否定、一笔抹杀,而对西方文化、西方文明又一味谄媚、盲目推崇,充分暴露了历史虚无主义者、文化虚无主义者的险恶用心和叵测居心。所以,历史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所反映的不仅是历史问题、文化问题,也是重要的政治问题;不仅是对待历史、对待文化的态度问题,更是对待现实的态度问题。尤其是在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上,历史虚无主义者、文化虚无主义者片面夸大了二者之间的对立,却忽视了二者之间的联系,实际上仍是“西方中心论”的形而上学的单线发展的文化思维、文明模式。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有精华和糟粕,也都有先进成分与落后成分。如果不加分析地全盘批判和否定,完全隔断与历史的联系、断裂文化的脉络,另起炉灶式的进行现代化建设,是根本走不通的。“我们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不能数典忘祖、妄自菲薄。”^[2]实践证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间并不是格格不入、难以兼容的,现代化的发展不能排斥和否定传统文化,只有赓续民族精神血脉、传承民族文化品格,才能开创现代化发展的广阔空间。中国式现代化就是以深厚的中华文化为根基的,以灿烂的中华文明为支撑的。作为世界上体量最大的文化群、历史悠久的文明体,中华文化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依然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蕴含强大的文化力量。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就是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获得养分而开辟出来的,就是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肥沃土壤、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化基因而日益拓展的。当然,尊重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非走向复古主义,而是结合时代条件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使其在当今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作为中华民族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其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不仅是我们中国人思想和精神的内核,对解决人类问题也有重要价值。”^[3]事实表明,西方式现代化并非现代化发展的唯一道路,西方文明也并非世界文明的唯一选择。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中,必须以正确的方式和态度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觉反对那些数典忘祖、妄自菲薄的历史虚无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4]警惕和抵制全盘否定、全盘西化的错误思想。

二、批判文化霸权主义、文化殖民主义,主张捍卫文化主权、维护文化安全

文化霸权主义、文化帝国主义、文化殖民主义等,都是西方国家推崇的文化思潮、奉行的文化策略。从概念生成的角度来说,虽然它们的提出时间有先后之别,但在概念内涵和精神实质上有共通之处。一般而言,它们指的是西方霸权国家从本国利益和战略目标出发,打着“文化全球化”“文化一体化”的旗号,凭借和依仗着自身由经济优势、科技优势、话语优势等构成的综合性优势,在意识形态领域利用多种文化产品、通过各种文化手段,进行文化扩张、文化入侵、文化渗透,在世界上到处倾销其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它们以自身的文化为标准,将自己国家或民族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强加于人,并力图对其他国家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进行诱惑或改造。文化霸权主义、文化帝国主义等,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在文化领域或国际文化关系中的突出表现,已经成为国际霸权主义的一种新形态,是霸权主义国家试图维持全球霸主地位所采取的一种新战略。文化殖民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侵略性和扩张性在文化方面的表现,也是传统的殖民主义形式在当代的发展与变种,它依然承继着传统殖民主义的侵略本性和残暴特点,是西方国家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进行文化殖民、精神殖民的新形式。就其本质而言,它们都是文化霸权观,是具体领域的文化达尔文主义或文化丛林法则。

文化霸权主义、文化帝国主义、文化殖民主义等所造成的现实危害是巨大的、深远的。一方面,西方国家利用自身的独特优势和力量,大搞文化霸权主义、文化帝国主义、文化殖民主义,对“非我族类”的其他民族文化进行文化歧视、文化压迫,以单向度的文化输出向全球强制灌输西方的价值理念、生活模式、社会制度,试图将全球都纳入它们的价值体系、文化体系,严重扰乱了不同类型、不同层次文化的平等交流秩序。这实际上就是一个文化一元化、文化同质化的过程,导致全球文化日益西化甚至美国化。这样一来,进一步巩固了西方国家在国际秩序中的主导地位,强化了西方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话语权,有利于扩大西方国家的既得利益和维护西方占优势地位的国际文化格局。文化由此成为西方国家排斥异己、打击他人,维护其霸权地位的重要工具。另一方面,以强势文化压制弱势文化,以西方文化取代甚至吞噬非西方文化,是对文化多样性和差异性的粗暴扼杀,是对世界文明多样性的严重侵蚀,“每一文化,皆有其自身的文明”。^[5]在西方文化的强势侵入下,一些发展中国家本土优秀文明传统和文化基因正在萎缩消亡,文明的创造力逐渐衰竭,民族特性渐趋消融,民族意识逐步淡化,民族传统文化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危机,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阻碍了世界文化多样性的发展进程。

近些年来,面对错综复杂、风云变幻的国际局势,西方国家依然以文化上的“世界宪兵”自居,大力推行文化霸权主义、文化帝国主义和文化殖民主义,文化歧视和文化压迫势头又有所发展。尤其是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西方国家推行文化霸权主义、文化殖民主义的手段更加精巧多样,文化渗透更具隐蔽性、复杂性和欺骗性,使得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一个政权的瓦解往往是从思想领域开始的,政治动荡、政权更迭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但思想演化是个长期过程。思想防线被攻破了,其他防线就很难守住。”^[6]文化霸权主义、文化帝国主义和文化殖民主义的不断推行,严重

损害了一些国家的文化主权,危及一些国家的文化安全。而文化阵地失守、文化领域失防,必然导致西方国家的文化扩张、文化渗透愈演愈烈,甚至引发一些国家思想文化领域硝烟四起、危机四伏,最终酿成政治动荡、政权倾覆的恶果。由于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差异,中国一直是西方国家进行文化渗透的重点对象。西方国家历来奉行“文化转基因”策略,试图通过“静悄悄的”文化输出,在文化领域向中国倾销和灌输西方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以之作为其“和平演变”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妄图达到“不战而胜”的目的。“我们必须既积极主动阐释好中国道路、中国特色,又有效维护我国政治安全和文化安全。”^[7]当前,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已启动实施的关键历史阶段,文化安全在国家总体安全体系中愈益重要。文化安全是深层次的国家安全,它关乎国家稳固、民族繁荣、精神传承,是国家政权、社会制度得以建立和维护的重要基础,具有突出的战略意义和全局影响。与此同时,在“两个大局”相互交织、相互激荡的当今时代,各种思想文化交融频繁,文化交锋日渐尖锐,西方的文化输出、文化渗透防不胜防,文化已成为西方国家遏制中国、打压中国的重要手段。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把捍卫文化主权、维护文化安全作为文化强国建设的重要前提和基本内容,不断坚定文化自信、历史自信,提升中华文化软实力,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8]因此,需要从战略高度增强文化安全观,强化文化安全意识,有效防范和应对西方文化霸权主义、文化帝国主义、文化殖民主义思潮弥漫下所带来的各种文化安全隐患和挑战。

三、批判“普世价值论”“普世文明论”,倡导全人类共同价值、各国独特文明

长期以来,“普世主义”叙事已成为西方话语叙事的主要手法,“普世主义”话语已成为西方话语霸权的重要特征,它根深蒂固地存在于西方社会的文化体系和精神世界之中。作为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话语,“普世主义”有着独特内涵和政治企图,同时也逐步形成了各种各样的论调和衍生形态,其中就包括“普世价值论”和“普世文明论”。所谓“普世价值论”,主要表现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把“自由、民主、人权”等定位和宣扬为“普世价值”,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价值观念。他们认为,“普世价值”应成为全球普遍接受和认同的价值规范,并在实践中一致采用、广泛践行的价值体系。从一定意义上说,“普世价值”本身即是西方政治制度、体制及其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代名词。西方国家极力宣扬和大肆鼓吹“普世价值”的政治目的,是要在世界范围内强制推行资本主义的政治理念、制度模式和价值体系,使之成为支撑和维系霸权主义世界秩序的精神鸦片和意识形态基础。事实上,西方国家所标榜的“普世价值”,是以霸权主义世界秩序为基础和依托的,同时它也构成了霸权主义世界秩序的合法性基础。当前,西方“普世价值论”已成为其对其他国家进行文化渗透、政治霸权甚至是和平演变的重要工具,是为资产阶级攫取利益、资本增殖服务的,也由此造就了崇力尚利、唯利是图、重效唯己的文化形态,正如约翰·汤姆林森所言:“普遍主义在当代社会、政治、特别是文化理论上,一直受到了人们众多的批评。”^[9]在此过程中,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普世价值”的“卫道士”和捍卫者自居,积极制定“普世价值”的国际标准,并通过各种强力手段在世界范围内大力推销,以维护其国际体系中的权威地位。

与鼓吹“普世价值”具有永恒性和普适性一样,西方国家还把西方文明等同于世界普世文明,使西方文明成为“普世文明”的独家代言者和唯一代表者。“普世文明论”暗含了西方文明具有优越性和主导性的逻辑预设,实质上是要通过文化渗透、文明输出,甚至是其他各种非正义手段来消弭文明的多样性,以实现西方文明价值一统天下、制霸全球的目标。亨廷顿也坦承,“普世文明”是“西方文明中

的人所共有的”,或者说,“西方消费模式和大众文化在全世界的传播正在创造一个普世文明”。^[10]他还揭露了“普世文明”的本质,“西方人眼中的普世主义,对非西方来说就是帝国主义。”^[11]对于“普世文明”和“普世主义”的现实作用,亨廷顿认为它们是西方用来对抗非西方社会意识形态的工具,“普世文明的概念有助于为西方对其他社会的文化统治和那些社会模仿西方的实践和体制的需要作辩护。”^[12]把自己的价值理念认定为“普世价值”,视自己的文化为“普世文化”,将自己的文明标榜为“普世文明”,并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竭力在世界范围内将自我的存在演绎为“普世”的存在,将自我的发展模式转化为适用于其他所有国家的范例和模板,这已成为渗入西方世界灵魂的一种思维定式和价值模式。对此,基辛格在《论中国》一书中也指出:“美国自建国以来笃信自己的理想具有普世价值,声称自己有义务传播这些理想。这一信念常常成为美国的驱动力。”^[13]毫无疑问,无论是“普世价值论”,还是“普世文明论”,都具有极大的虚伪性、迷惑性、欺骗性。它们以“普世主义”的面目出现,自我定位、自我塑造为一种超越民族、种族、国界、信仰和衡量是非善恶的最低尺度以及人类道德的共同底线,实际上是为其统治全球的行径和企图加以掩饰与辩护。正如英国学者汤林森(John Tomlinson)在《文化帝国主义》中所指出的:“以特殊取代普遍,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意识形态策略。”^[14]“普世价值论”“普世文明论”都是以抽象的普遍主义为基础,以共相遮蔽殊相,以共性否定个性,其越是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大肆蔓延,就越需要人们认清其“虚假面目”,把握其“弦外之音”,警惕其“醉翁之意”。

与“普世价值论”“普世文明论”所内含的盲目排他性与唯我独尊性不同,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从全人类共同利益、根本利益出发,遵循文化发展、文明演进的内在规律,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社会主义文明观。建立在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基础上的“普世价值论”,具有突出的以点概面、以偏概全特点。因为它们将西方价值观冠以“普世”的“美名”加以推广,实质上是为了否定和排斥其他国家的价值观,从而确立其资本主义世界的价值共同体。而习近平总书记根据全人类共同、普遍生活提炼出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则反映了人类社会的共同价值追求,是国际社会普遍接受和广泛认同的价值观。“普世价值论”的话语主体是西方国家尤其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话语主体则是不论大小、贫富和强弱的世界各国;“普世价值论”在内容上具有封闭排他性,全人类共同价值则具有开放包容性;“普世价值论”服务于一己之利、局部利益,全人类共同价值则指向于人类共同利益、根本利益。所以,“我们应该大力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共同为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提供正确理念指引。”^[15]根本言之,西方文明是在西方现代化过程中形成的,受特定时空条件、经济条件、制度条件等支配和限制的文明形态,这种个性化、特殊性文明不可能成为“普世文明”。正是因为发展道路、发展模式上存在着诸多差异,决定了不同的现代化道路必然会孕育出不同的文明形态,“一个和平发展的世界应该承载不同形态的文明,必须兼容走向现代化的多样道路。”^[16]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开创性、拓新性,创造出了与西方文明截然不同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发展道路、发展模式的多样化、多元化,造就了世界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在文明内涵、文明方向、文明风貌等方面的差异,构成了各具特色、共生共存的世界文明图景。“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等及其伟大实践,是对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17]从这个角度来说,各国文明不是千篇一律、风格一致的,而是共性与个性有机统一的。不同文明形态之间具有独特性、差异性,是世界文明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必然趋势。

四、批判文明等级论、文明优越论,倡导文明平等、文明共存

文明等级论、文明优越论代表着西方社会的文明观,反映了他们对人类社会文明秩序、文明格局、

文明体系的基本认识。文明等级论是以西方社会的发展水平为“文明”的标准或基点,将整个世界按照文明程度划分为由三个层次构成的秩序格局,即最高级的“文明”,中间的“半开化”,最低级的“野蛮”。西方国家对文明程度的评判,主要依据一个国家的国力强弱、生产方式的优劣、科技水平的高低等外在“物化”程度。按此标准,西方文明是文明秩序格局中的最高等级者,代表着其拥有强大的实力、先进的生产方式和高超的科技水平。其他发展层次较低的“半开化”和“野蛮”,则需要进行“文明学习”,接受“文明改造”,而其参照物就是西方文明。以文明等级论为逻辑基础,西方国家大肆渲染文明优越论。在他们所构建的文明等级次序中,西方文明处于优势地位,具有无与伦比的优越性和竞争力,是其他文明心之所向的理想社会、“彼岸世界”。而其他文明在文明程度、文明等级方面都是低于或次于西方文明的,因此处于从属或附庸地位,只能仰望或追随西方文明。在文明等级论者看来,其他文明不能质疑或挑战西方文明的优越性,而必须归顺或依附于西方文明,要么被西方文明所压制,要么被西方文明所同化。而一旦有超越西方文明的异质性文明出现,就会被当作异端而被严加防范和无情打压。也就是说,世界上不能有与西方文明并驾齐驱甚至优于西方文明的其他文明存在。与文明优越论相伴而生的还有“种族优越性”,二者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片面认为自己民族是优等民族,视自己的文明为优等文明,而其他民族、文明则是劣等民族、劣等文明,其背后蕴含着改造甚至取代其他文明的战略目的和政治图谋。进而言之,认为西方文明“高人一等”,而其他民族和文化“低人一等”,暗含了其他民族和文化必须接受西方文明统治和主宰的逻辑陷阱,本质上是为他们肆意征服、侵略其他国家和民族寻求正当化、合理化理由,是美化和粉饰他们殖民主义、霸权主义行径的一种手段。

西方文明等级论、文明优越论甚嚣尘上、大行其道,其消极影响不容低估。具体而言,一方面,文明等级论、文明优越论赋予了西方国家文明优越感和自负感,使他们对自己的发展模式、文明水平等更加盲目自信,甚至自诩为“人类文明的灯塔”,“历史终结论”也由此而生。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看来,他们就是世界的“霸主”和“王者”,是世界秩序的主导者和其他国家、民族命运的主宰者,这就为其对外劫掠、巧取豪夺,以及居高临下地对其他国家指手画脚、横加干涉提供了正当性借口、合法性依据。另一方面,将西方文明、西方文化思想置于“文明等级”体系的上层或顶端,并占据强势支配地位,其他文明则需受其笼罩、任其主导、听其摆布,否则就会受到西方国家的谩骂、诟病甚至是肆意攻击。正是由于长期受到西方文明等级论、文明优越论的影响和蛊惑,以及现实中的坎坷遭遇、屈辱地位,使得一些国家和民族的民族自尊心、文化认同感受到严重打击与伤害,甚至由此产生了文化依附心理、文化自卑心理,倾向于轻视、贬低、抛弃自己的民族文化,进而认同和仰视西方文明。向西方文明看齐,按照西方文明进行改造,把西方的“文明标准”奉为“思想准绳”和“行为准则”,使一些发展中国家逐步沦为西方国家亦步亦趋的模仿者、追随者,更加陷于各种发展陷阱和困境中难以自拔。

认为人类文明存在着优等与劣等、先进与落后之分,构建起文明优劣的等级秩序,将西方文明定位和标榜为优等文明、先进文明,是其他文明模仿和复制的对象,不仅背离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本质,而且极大地阻碍了文明交流互鉴的进程。这样一来就否定了其他文明的独立价值和发展轨迹,忽视了其他文明对人类文明发展作出的独特贡献,也从根本上否认了不同文明之间的平等地位。究其原因,还是西方国家基于利益攫取而产生的傲慢与偏见。与之不同,我们认为不能以物质文明的发达与否或科技水平的高低与否等为标准,来评判一种文明的高低优劣。“各种人类文明在价值上是平等的,都各有千秋,也各有不足。世界上不存在十全十美的文明,也不存在一无是处的文明,文明没有高低、优劣之分。”^[18]任何一种文明都有其独特的生成基础、发展路径和存在价值,都是人类文明图谱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都为人类文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虽然不同文明之间存在差异性、多样性,但却

没有高低、优劣之分,没有尊卑、文野之别,而是各有千秋、各具姿容的,是地位平等的关系。“每一种文明都扎根于自己的生存土壤,凝聚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非凡智慧和追求,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人类只有肤色语言之别,文明只有姹紫嫣红之别,但绝无高低优劣之分。”^[19] 不能将文明之间的差异视为文明的等级高低不同,更不能人为地将一种文明凌驾于其他文明之上,让其他文明对其顶礼膜拜、仿照效法。如果这样的话,不仅违背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客观规律,逆反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潮流所向,而且窒息了其他文明的生机与活力。“不能唯我独尊、贬低其他文明和民族。人类历史告诉我们,企图建立单一文明的一统天下,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20] 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任何一种文明都不可能通过依附于人而获得长久的生命力,反之,也不会有任何一种文明通过贬低和压制其他文明而获得永恒的优势地位。不同文明之间只有相互尊重、平等相待,才能推动人类文明的不断发展与进步,这也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内容和重要导向。总之,习近平文化思想跳出了西方文明等级论、文明优越论的话语窠臼和思维藩篱,从人类文明发展的大局和整体出发,倡导文明平等、文明共存,尊重不同文明的独特性、合理性,反映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共同价值追求。总之,习近平文化思想中的文明主张、文明倡议,蕴含着深厚的文明底蕴和独特的东方智慧,展现着中华民族与众不同的文化观、文明观,在价值理念、价值导向等方面实现了对西方文明等级论、文明优越论的巨大超越。

五、批判文明隔阂论、文明冲突论,倡导文明互鉴、文明交流

所谓“文明隔阂”,是指不同文明间互不来往、互不相通,反映的是一种自我固守、自我封闭状态。而由亨廷顿所提出的“文明冲突论”,虽然引起了广泛争议和普遍质疑,但却是近些年来一个颇具影响的学术概念和政治话语。在他看来,“文明”的异同是确认敌友关系的关键依据,从20世纪后期开始的一系列冲突,已经由国家民族之间及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转变为“文明之间的冲突”。文明冲突论的思想基础依然是西方中心主义和霸权主义思维,是西方所一贯奉行的弱肉强食、丛林法则在文化领域、文化方面的运用。在西方所竭力主张和推崇的等级制的文明观、文明秩序中,西方文明占据着统治地位,拥有着实力优势、话语优势、心理优势等,其他文明则被西方文明所压制、支配。对于其他文明而言,要么束手以待,被西方文明同化,沦为西方文明的附庸;要么奋起反抗,同西方文明抗争,以此获得一些生存空间。由此,文明冲突也就难以避免了。正是因为西方在文明观、价值观上出现了严重的扭曲和错位,才使得“文明冲突论”等带有浓重意识形态色彩的各种错误思潮甚嚣尘上,成为阻碍和制约人类文明发展的消极因素。事实也证明,西方对待不同文明所奉行的党同伐异、强制同化政策,不仅无法消除文明之间的差异,反而会极大激化文明之间的矛盾,使文明冲突成为常态。受之影响,当今世界文明偏见、文明歧视、文明对抗、文明冲突等现象在一定范围内依然存在,不同文明之间“并育而不相害”“并行而不相悖”的和谐局面远未形成。

事实上,文化多元性、文明多样性是一种客观的自然规律,世界因多样性而繁衍生息、多姿多彩。基于不同的自然条件、历史条件、社会条件等所形成的不同文明,本身是多种多样、千姿百态的。而由不同文明传统形成的文明单位、文明体系也是多种多样的。不同文明间的差异性与整个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共同构成了并存共生的关系,二者之间是不可分割、紧密相连的。而不同文明虽然形成时间先后有异、历时长短不一,但都是人类文明图谱中的有机组成部分。文明之间是平等的,同时也是各有所长、各有短板的,这也是文明之间进行交流互鉴的逻辑前提。“不同文明凝聚着不同民族的智慧和贡献,没有高低之别,更无优劣之分。文明之间要对话,不要排斥;要交流,不要取代。”^[21] 如果一味强调、片面注重本民族文化的特殊性、独立性,而没有充分的交流互鉴,那么就不可避免地使文明趋向

同质化,最终导致文明的僵化或衰亡;如果世界上只存在西方文明一种文明样式,那么其并不会因此而日益繁荣,反而会慢慢干枯凋零。质言之,任何一种文明的生命力都在于交流互鉴,封闭保守、盲目自大只会导致文明丧失生命力。正是由具有各自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和信仰的不同文明体,构成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多彩画卷。所以,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文明交流互鉴史,“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22]

近些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和信息技术的迅猛进步,文化交流与相融的趋势愈益深入。不同文明之间已形成了一种命运共同体关系,相互之间“俱荣”和“俱损”的效应愈加明显。从一定程度上说,文明犹如物种,任何单一的物种都难以生存,任何单一的文明也难以持续;物种和文明都需要多样性,多样性是生物“天长地久”之重要基础,是文明“可久可大”之根本依赖。一种文明要获得长久的生命力和强大的竞争力,就必须善于从其他文明中取长补短、择善而从,实现兼收并蓄、融合发展。正因如此,习近平总书记将文化喻为生命有机体,正如生命有机体需要从自然界获取养分来维持新陈代谢一样,文化也需要从彼此交流学习中获取先进的养分来推动自身的更新发展。“一切生命有机体都需要新陈代谢,否则生命就会停止。文明也是一样,如果长期自我封闭,必将走向衰落。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23]但是,文明之间交流互鉴的前提是文明平等,这种平等并非通过处在强势“屈尊”弱势的方式获得,也非通过位于弱势“顺从”强势的方式获得,而是建立在相互尊重、兼容并包基础上的。文明交流互鉴可以消除不同文明之间的隔膜与偏见,实现文明之间的和谐共生、共同发展。同时,“交流互鉴论”也是对文明间老死不相往来的“平行论”、优劣冲突的“强弱论”的批判和超越,与西方霸权主义的话语叙事形成了鲜明对比。“只要秉持包容精神,就不存在什么‘文明冲突’,就可以实现文明和谐。”^[24]文明交流互鉴论蕴含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和而不同、“理一分殊”的理念,展现出了厚重的天下情怀、深厚的文明底蕴和宏大的文明气度,也彰显着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开放性、包容性和世界性。所以,不同文明间需要彻底抛弃文化上的“冷战”思维,以共同利益为基础,以共同发展为目标,推动文明相通与相融,共同谱写人类文明的新篇章。

注释:

- [1]《习近平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利文化条件》,《人民日报》2023年10月9日。
- [2][3][7]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第90、342、338-339页。
- [4]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71页。
- [5][德]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第1卷,吴琼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102页。
- [6][8]《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21、16页。
- [9][英]约翰·汤姆林森:《全球化与文化》,郭英剑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82页。
- [10][11][12][美]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年,第36-37、161-162、45页。
- [13][美]亨利·基辛格:《论中国》,胡利平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第517页。
- [14][英]汤林森:《文化帝国主义》,冯建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05页。
- [15][16]《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第475、469-470页。
- [17]《习近平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正确理解和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人民日报》2023年2月8日。
- [18][22][24]《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229、228、230页。
- [19][2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468、469页。
- [20]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133页。
- [2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524页。

[责任编辑:刘 鑫]